

【光复之城】

1911年10月22日,长沙光复

在小吴门,18岁的毛泽东看到墙头升起白旗 在水风井,贪图便宜的伙计差点误了革命大事

☑ 辛亥革命湖南人物档案



刘道一(1884~1906)湖南衡山县人。青年时代追随其兄刘揆一从事革命活动,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,年仅22岁,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位烈士。



1911年10月22日的长沙地图。

■制图/杨诚

1911年10月10日,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。

那个从武昌逃跑,引发清王朝轰然崩塌的湖广总督瑞澂,在当天上奏朝廷的电报中就预测道,“革命党人是把湖南当作最早支持革命最有希望的地方”。

瑞澂说得一点没错。

武昌起义后,长沙就是一个充满革命的火药味的“火药桶”。继武昌起义12天后,即10月22日,300多名新军,成功攻入长沙城中,赶走湖南巡抚余诚格,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中心城市。长沙光复不但解除了武汉的后顾之忧,并派兵援鄂,更促使全国十余省份继此之后陆续宣告独立,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由此创建。

为什么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城?在这个“火药桶”中,长沙城的革命,是怎样闹起来的?在10月22日那一天,长沙城里那位18岁的青年毛泽东的眼中,看到了什么?



刘复基(1884~1911)湖南常德人。1904年加入华兴会,次年流亡日本,加入同盟会。1911年夏,因起义机关暴露被捕就义,临刑时犹呼“同胞速起,还我河山”等口号。

壹

“火药桶”中的辛亥长沙城

武昌起义后第三天,湖北革命党人潜入长沙

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继武昌首义之城后的首应之城,除了湖南在晚清一直具有优良革命传统外,洞庭湖南北两省的反清革命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前,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。

1904年,因起义计划暴露,湖南的会党领袖马福益被杀,黄兴等革命党人纷纷逃离长沙;1906年,萍浏醴起义失败,禹之谟被虐杀。湖南的反清骨干力量因为这两次失败明显减弱,不及武汉。但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,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、阎鸿飞、杨任已潜至武昌,参加会议。他们和孙武、蒋翊武约定:“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,如湖北首先起义,则即日响应;湖南首先起义,则湖北即日响应,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。”

武昌起义后第三天,湖北派蓝宗、庞光志携蒋翊武的介绍信,到长沙太平街贾谊故居内的革命机关体育社找焦达峰和阎鸿飞。湖北革命党人由此与湖南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。就在革命党人暗中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之时,以谭延闿为代表的湖南立宪党人,也知道在当前形势下革命无法避免。但是立宪党人既要革命,同时又希望能避免暴乱。为了“统一战线”,他们还向当时实际总揽长沙巡防营兵权的黄忠浩反复劝其投身革命。就在长沙起义前夕,党人还致函黄忠浩,请其率兵反正,数日之间,约七八百件(信),但黄却不为所动。为了分散革命势力,黄忠浩还劝湖南巡抚余诚格,将长沙城里可能发动革命的新军成批调出城外。

12天之间,长沙新军起义两次流产

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0月22日长沙起义的12天之间,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新军,至少发生两次不成功的新军“起义”。

一次是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夜发难,结果因为炮弹被收缴上交无法鸣炮为号而告不成。八月二十七日因军营防范严密,无法举火为号,引起部队新军士兵在哨声中半夜惊醒,持枪群聚野外,喧呼革命,但却无人组织和领导。不久,新军军官全副武装赶来,呵问怎么回事。新军士兵无以应对,只能默默离去。但军官惧怕引起事变,亦未就此深究。

长沙城内的革命党人也躁动不安。革命党人吴作霖在长沙决定起义的前一天,左思右想觉得革命党人力量微薄,“一时举事失败,革命未成,而湘省先成齏粉,辗转思维,彻夜不寐,欲求一避免流血之法,只有恐吓、劝诱同时并用。”就在长沙起义前一天早晨,他闯到今民主东街的湖南谘议局(今省总工会),当时号房刚起床,他厉声责骂:“我是革命党人,不怕死的,我姓名叫吴作霖,我手下已有三千来人,分驻满城旅馆商店等处,除各有炸弹、短刀外,人备火柴一盒,将来举事,只要各将火柴刮燃,就可将长沙全城烧为平地。你们这帮议员,号称人民代表,现已死到眉毛巅,这时还不到局,要他们干什么!”愤愤然扬长而去。此事一时传遍长沙城,让人顿感长沙随时会像火药桶一样轰然炸得全城稀烂。其时长沙城内的玉泉山、火宫殿等处,革命党人散发传单,激昂演讲,司空见惯,警察因担心引起公愤,不再愿意过度干涉。城市革命的狂热气氛让人有窒息之感。



蒋翊武(1884~1913)湖南澧州(今澧县)人。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、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。

(下转A23版)